

巴哈伊文献集成

5
卷

Chinese Studies on the
Bahá'í Faith: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第

蔡德贵
卓新平
宗树人
于维雅
雷雨田

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巴哈伊文献集成

蔡德贵
卓新平
宗树人
于维雅
雷雨田

主编

Chinese Studies on the
Bahá'í Faith: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第

5

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哈伊文献集成/蔡德贵等主编.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607-5215-0

I. ①巴…

II. ①蔡…

III. ①宗教—文献—汇编

IV. ①B98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2864 号

责任策划:傅 倪

责任编辑:傅 倪 刘森文

陈 珊 徐琳琳

装帧设计:牛 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880 毫米×1230 毫米 1/16

153.75 印张 378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0 元(全五卷)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baha'i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巴哈伊原典文献翻译与研究项目
山东大学巴哈伊研究所
广州大学巴哈伊研究中心

联袂推出

目 录

从“和而不同”到“多样性之统一”

——中国传统思想与巴哈伊教比较研究的一个侧面	吴晓群……(1881)
儒学与巴哈伊信仰：和谐社会思想之比较	蔡德贵 卞宗艳……(1890)
“追求内心和谐学术研讨会”举行	于光……(1915)
印度面对面(节选)	刘以林……(1916)
科学、宗教与社会及经济发展	
——巴哈伊教为和谐社会做贡献的思考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 龙飞俊……(1918)
保罗的修辞回应(节选)	[美]杨克勤……(1921)
巴哈欧拉名言	李剑桥主编……(1922)
两种大同观及对未来世界的意义	蔡德贵……(1923)
伊朗历(节选)	[英]霍尔福德-斯特雷文斯著，萧耐园译……(1947)
巴布派起义	吴云贵 周燮藩……(1948)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中相关介绍	苑耀宾主编……(1950)
永恒主义哲学(节选)	安桂清……(1954)
伊朗巴布教派运动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全国经学院统编教材编审委员会编……(1955)
心灵的净化：巴哈伊莲花(节选)	萧默……(1957)
印度传统美的模式	
——印度归来话美学之四(节选)	李翔德……(1960)
巴哈伊	金纲……(1961)
基穆关系和解个案的重大意义	曹兴……(1962)
西方殖民统治在中东的确立与阿拉伯世界的反抗(节选)	李群英……(1965)
拉巴尼夫人	贵阳市花溪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66)
培养青少年成为全球化公民的道德教育	[新加坡]张泉治著，徐志芳译……(1967)

- 《先知》与阿博都·巴哈 张宗奇.....(1973)
- “天下一家”的巴哈伊教 严安林 盛九元 胡云体编著.....(1979)
- 伊朗巴布教徒起义 蔡磊主编.....(1985)
- 现代主义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继续发展及后现代主义建筑(节选) 萧 默.....(1991)
- 近代伊斯兰教改革运动是怎么一回事(节选) 秦学顾编著.....(1992)
- 创造力的启示 潘石屹.....(1993)
- 人类即将进入成熟期 潘石屹.....(1996)
- 纪伯伦与阿布杜巴哈 许 宏.....(1997)
- 中东地区宗教中的少数派(节选) 王 联.....(2001)
- 以色列巴哈伊圣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相关报道 (2002)
- 灵魂的台阶 Evan.....(2003)
- 主张世界大同的巴哈伊教 陈来元.....(2006)
-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反响(节选) [法]罗曼·罗兰著,邓金玉译.....(2011)
- 光是美好的 [美]查尔斯·哈尼尔著,覃益群 王秋洁译.....(2012)
- 中国文化视野中的人与动物关系问题
——以异种移植为例(节选) 雷瑞鹏.....(2013)
- 新兴宗教研究 卓新平.....(2014)
- 永不改变的信仰
——关于艺术家张羽(节选) 邹建平.....(2017)
- 张羽心象
——张羽《随想集》审美识(节选) 邓平祥.....(2018)
- 巴哈伊教 熊坤新主编.....(2019)
- 印度风情(节选) [美]张明磊.....(2020)
- 《伊斯兰教史》中相关介绍 金宜久主编.....(2021)
- 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当代中国时代呼唤(节选) 周直 王世谊主编.....(2023)
- 阿富汗(节选)
..... [瑞士]葛碧建 葛安妮 [美]傅亚伦 艾迪丝著,万兆元 王安民译.....(2024)
- 巴布教徒起义 符文军主编.....(2025)
- 伊朗巴布教徒起义 王春良 刘文涛主编.....(2027)
- 灵明堂与巴布派的历史接触之可能性探讨 王建平.....(2028)
- 巴哈伊教花园 王昌义 吴珉珉.....(2038)
- 巴哈伊教 章亚南 陈泽梁主编.....(2041)
- 玛格丽特的故事(节选) 黄鹤峰.....(2043)
- 巴哈伊教在台湾早期的传教活动略论 陈进国.....(2045)
- 巴布运动 王俊荣.....(2057)
- 巴哈伊教在澳门的会所 许 政.....(2059)

巴哈教	[英]加布里埃尔 吉维斯著,高师宁 周齐译	(2063)
近 20 年来我国巴哈伊教研究简述	吕耀军	(2065)
从“众神狂众”到“信仰自由”		
——意大利人的信仰世界(节选)	杨晓军 赵素花	(2069)
从同情巴哈伊教看其宗教观	周加才	(2070)
阿哥拉堡 印度国家博物馆 莲花庙(节选)	学诚大和尚	(2072)
伊斯兰教的主要教派(节选)	丁金光	(2073)
德里的莲花寺、印度门、甘地陵园	董贻正	(2074)
认识印度文化的意义(节选)	郁龙余	(2076)
引人注目的新宗教——巴哈伊教	庞秀成	(2077)
巴哈伊教神秘主义源流	吕耀军	(2081)
巴哈伊教义的普世伦理观与“底线伦理”的比较	庞秀成	(2084)
简论巴哈伊之上帝创物与老子之道生万物的异同	万丽丽	(2092)
药物滥用和药物依赖预防中的社会心理因素(节选)		
[加]A. M. Ghadirian 著,刘荣涛译	(2097)	
张欣:不谈财富谈慈善	牟小浦	(2098)
神意笼罩的大地(节选)	喻 静	(2100)
伊斯兰阿拉伯的文化(节选)	蔡德贵	(2101)
当代主要新兴宗教的基本状况与趋势(节选)	何希泉	(2103)
新兴宗教研究(节选)	卓新平	(2104)
人类关系的统治者模式(节选)	[美]里安·艾斯勒著,程志民译	(2105)
莎河与我	[加]东方白	(2106)
海法和西加利利的巴哈伊圣地	舒醒 李红浪 李星主编	(2107)
巴哈伊庙	于彤 刘志刚	(2110)
近现代的伊斯兰教(节选)	周燮藩	(2112)
伊斯兰教的新兴教派(节选)	金宜久	(2113)
伊斯兰教的社会运动(节选)	金宜久	(2114)
《辞海》中相关词条	夏征农 陈至立主编	(2115)
《宗教词典》(修订本)中相关介绍	任继愈主编	(2116)
灵性的芬芳	燕 燕	(2118)
宗教大历史	[法]让·德吕莫 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内著,余磊译	(2121)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 2 版)中相关介绍	中国大百科总编辑委员会主编	(2123)
广厦:中国与新世界秩序研究	[加]乔卡特著,石沉译	(2125)
“共建和谐:科学、宗教与发展”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马 景	(2169)
巴哈伊教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维建	(2171)

从整齐一律到“杂乱”有章

- 当代西方建筑赏析(节选) 彭一刚 (2173)
宗教学(节选) 段德智 (2174)
圣土上又一朵宗教之花 高秋福 (2175)
巴哈伊教 卓新平 (2179)
构建与重构宗教生活(节选) [美]莱斯特·库尔茨著,薛品 王旭辉译 (2180)
儒学与巴哈伊信仰比较研究 蔡德贵 (2181)
《巴布宗教思想研究》序言 蔡德贵 (2342)
巴哈伊教 [英]迪·菲利普斯等著,王子夏译 (2349)
世界宗教的象征符号及其解释 卓新平 (2350)
巴布宗教思想述要溯源 吴云贵 (2352)
从当代巴哈伊教的灵性看宗教和科学的关系 周燮藩 (2357)
巴哈伊教的发展话语构建初探 邱永辉 (2364)
乌干达巴哈伊教考察 李维建 (2372)
巴哈伊教灵曦堂建筑艺术 周卡特编译 (2378)
简论当代伊朗宗教管理的特点(节选) 冀开运 (2383)
一个特殊的非政府组织:巴哈伊 成亚曼 (2385)
中国新兴宗教研究的特色(节选) 邱永辉 (2388)

从“和而不同”到“多样性之统一”^{*}

——中国传统思想与巴哈伊教比较研究的一个侧面

吴晓群

“和而不同”是一个近年来在中国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作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在这个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交织的时代，它早已从专治中国古典文化之学者对其的追源、考证、说明，进入了整个学术界、文化界以及大众媒体之中，甚至在政治家们阐述各国间的关系、商人企业家们讨论各自的经济利益时都会提及于此。这仿佛成了一个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概念。的确，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和而不同”的精神作为文化交融、碰撞中的一种准则，不仅体现在汉唐时期的文化交流中，也贯穿于两千年来的中华文化之中。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汉民族曾有过无数次与匈奴、契丹、女真、蒙古、满族以及南方边远部族的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记录，如被许多人引以为“国粹”的“京味”文化就有许多满族文化的成分融汇其中。正是有了这种存异而致和的博大胸怀，中华文化才能延续至今仍充满生机；否则，也早已像有些古老的文明一样成为历史的遗迹了。今天，中华文化虽然不再是单一的汉文化，却无人能否认它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

然而，时至今日，这一概念是否仍能充分地适宜时世，并运用于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文化与文明冲突的问题呢？我们对这种看法带有一定的保留性。首先，从史伯（《国语·郑语》）、晏子（《春秋·昭公二十年》）论“和”与“同”的关系始，到孔子及后世儒家先贤们对这一概念的继续阐发，“和而不同”，正如孔子所说的，它作为一种君子的行为准则，这种“和”多多少少都带有一种在君临他者时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感。特别是当它作为异质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一个基本原则时，它能保证不同文化间的真正平等吗？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了“夷夏之辨”，在孟子看来，华夏文化远远优越于四夷文化，故只能“用夏变夷”，而不能“变于夷”（《孟子·滕文公下》）^①。两千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可以说是毫无反思地承袭了孟子的这一说法，而汉唐的兴盛更加强了这种心态。于是，之后，在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相遇之际，就有了一种“泱泱大国”的“汉唐心态”。虽然古圣先贤们一直教导说要“和而不同”，但历代先哲所固守的“夷夏之辨”却多少潜在地透露出一种非对称性的消息。事实上，与这种原则伴生的“汉唐心态”，在面对异质文化时，从根本上说是很难真正地“承认他们的文化也具有与本文化同等的重要意义”^②。

因此，这就令我们不得不加以反思：为什么我们在强调“和而不同”的同时，却又强调“夷夏之

* 原载《当代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

① 冯友兰先生说：“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地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2页）

②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9页。

辨”？当然，长期以来我们曾是文化优越者，故不论是讲“和而不同”，还是讲“夷夏之辨”，其中的含义都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其中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只是我们不曾严肃地将它当作一个问题而已。直至20世纪末，西方学者才对此提出了尖锐的质疑，1998年在波士顿召开的世界哲学家大会上，著名汉学家史华慈就向乐黛云先生提出，虽然烧菜的时候，只有油、盐、酱、醋各不相同，合在一起才能成为美味佳肴，但是，到底该由谁来掌勺呢？^①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主导权问题。史华慈问题的实质是，全球化绝决不是一个中性的，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可以同等参与的餐席，而必然要由某个“主权者”来对其加以安排，那么到底谁是这场文化餐席中的主权者呢？这便成为一个争执不下，而谁也不肯放手的问题。虽然，我们今天是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再次提出这一概念，但如果我们要在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使“和而不同”作为其他民族、其他文化也能接受的概念，我们就必须解决当今文化交流中的这个文化主导权问题。应该看到，尽管我们的祖先并没有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一新难题提供预先的答案，但是他们确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概念。或者，我们是否还能从其他的精神资源中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找到某种可供借鉴的东西，抑或只是提供一种思考问题的新视角，以补充“和而不同”原则的不足？

回答是肯定的。在此，本文所借鉴的对象是巴哈伊教(the Bahá'í Faith)所倡导的“多样性之统一”(Unity in Diversity, 或译作“多样一体性”)的原则。我们将其视作是对“和而不同”传统的一个现代阐释与提升。之所以能将这两个跨越时空的概念放在一起加以考查，是因为它们都共同表现出一种文化宽容与文化共享的情怀，而它们对于“和”这一理想境界的追求也都不是简单的“同一”。它们都认为“和”与“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是事物发展的前提，所谓的“和”，指的是各种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协调配合，取长补短，才能产生最好的效果，如五味调和才能产生美味，六律相和才能产生好的音乐等等。与“和”相反的是“同”，“同”是指事物某方面的单一发展，这样必然使事物失去正常的和谐之序。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也就是说有“异”，这是前提；而异又可以合为一，即实现统一。所以“和”是众多的统一，“同”则是单一的重复。无异的“一”是“同”，有异的“一”才是“和”。在巴哈伊教中，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时常被喻为同一个花园里的花朵。只有当花儿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和色彩时，花园才是最美丽的。阿博都·巴哈('Abdu'l-Bahá)形象地说：“想想同一个花园中的花朵，它们虽然种类、颜色、形状不同，但却为同一眼泉水所滋润、为同样的轻风所吹拂、在同一个太阳的照耀下，这种多样性更增加了花儿的美丽与魅力。因此，当统一的力量，即上帝之言产生效力时，种种不同的习俗、观念、性情等等都将为人类世界添姿加色。”^②阿博都·巴哈又进一步指出：“这种多样性，这种不同就如同人体自然形成的不同的器官、肢体一样，而每一部分都对整体的美丽、所具有的效能及其完美有所贡献。”^③这第二个比喻更为有力地证明了“多样性之统一”的原则，因为，显然没有各个肢体和器官的合作，人体是无法存活、行动的。可见，这种关于“统一”的概念，并不是要求大家千篇一律、一模一样，差异性包含在其中。巴哈伊教欢迎多样化，并深信多样化能够提供新思想、新契机、推动文明的进步。“和而不同”也认为“和”具有创造性，“和”的统一产生

^① 参见乐黛云：《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割据主义可以对话吗？》，该文系2002年8月“文明对话：东亚现代化的含义”国际研讨会暨中国哈佛—燕京第四届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② 'Abdu'l-Bahá,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Abdu'l-Bahá*,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p. 290; 还可参见'Abdu'l-Bahá, *Paris Talks*,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p. 51;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pp. 24-51, etc.

^③ 'Abdu'l-Bahá,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Abdu'l-Bahá*,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p. 290.

新事物,故“和”是发展之本,前进之基,生长之根;而“同”只是同一事物的简单相加,不能产生新事物,故不具有创造性、再生性和持续发展性。

在有着这些共识的基础上,“多样性之统一”的精神又较好地解决了“和而不同”原则所面临的两大难题:一、“多样性之统一”的原则与巴哈伊教另一同样重要的观念“人类一家”结合在一起,克服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中心论及大文化的心态;二、“多样性之统一”的原则是以接受至高、普世的上帝为前提的,这就解决了文化主导权之争的问题。

当今世界,各种显见或隐含的文化中心论或大文化心态,都是由于认为本文化明显优越于其他文化,因而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在文化交流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态度致使文明对话的过程变得困难重重、举步艰难。以我们自身为例,虽然汉唐盛世早已成为历史的遗迹,但大文化的心态仍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如20世纪初梁启超认为可以“东方的精神文明解决西方的物质疲惫”,如今又有不少人提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等等假说。果真如此吗?其实只要我们稍微打开一些视听,就会发现这些说法多少都有自说自话、一厢情愿之嫌。怎样将我们的文明从“教导的文明”(teaching civilization)转为“学习的文明”(learning civilization),这是克服大文化心态的关键,也是我们既保持自身文化特色,又与其他文化平等交流,共同创造人类新文明的关键。

雅斯贝斯曾毫无保留地宣称,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孔子和耶稣都是人类历史中最有影响力的精神文明塑造者。由此,作为一个欧洲的学者,他超越了自身所可能具有的欧洲中心论的立场,而从文明之间应该互相参照、互相学习的心愿出发,为各种文明展开了对话的可能空间。

而早在150多年前,巴哈伊教的创始人巴哈欧拉(Bahá'u'lláh)就明确提出,所有世界性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上帝的使者,他们也都是人类神圣的教育者(Divine Educators),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分别适应了不同时代人类的不同需求而已。^①这种观点为各民族、各文化间彻底平等的对话与沟通提供了一个神圣的基础与保证。而巴哈欧拉关于“地球一村,人类一家”(“The earth is but one country, and mankind its citizens.”)^②的提法及有关人类文明成熟期的理论。^③则明确地将整个人类视为“一个”统一的独特的种族,他形象地将人类比作“一树之果、一枝之叶”^④。但是,偏见、无知、自大以及对权力的追求阻碍了许多人承认并接受人类的这种一体性。为此,巴哈伊教从根本上反对有史以来人们头脑中关于不同人种、不同文化的种种偏见与歧视。不过,它并不追求人们之间任何的同一性,相反,它将种族的、文化的、语言的以及习惯的不同视作是自然的表达,它在人类

^① 参见 Bahá'u'lláh,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translated by Shoghi Effendi,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1976, p. 47, pp. 287-288; *The Kitáb-i-Íqán*, translated by Shoghi Effendi,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pp. 103—104, 152, 177-178, etc.

^② Bahá'u'lláh,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p. 250.

^③ 巴哈伊教认为,人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也处于一种不断进化的过程中。如同一个人必然经过其幼年、童年、少年、青年时期而进入其成熟期一样,人类的社会组织也从最初的血缘家庭,逐步经历了氏族部落、各种形式的城邦直至民族国家的崛起,未来则将以地球为单位形成宇宙间的一个基本构成。而今日之人类正在从它的青春期向其集体成熟期过渡。(参见 Shoghi Effendi, *The Promised Day is Com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96.)

^④ Bahá'u'lláh,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p. 288.



中培养其不同的个性^①。

“多样性之统一”的思想怀抱着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一方面接受多元,另一方面坚持通过磋商来取得共识。“它既没有忽视,也没有试图隐瞒那些使世界上各种族、各民族彼此相异的在种族起源、气候、历史、传统、语言、思想与习惯等方面多样性。然它招呼更广泛的忠诚、更博大的抱负,超越于任何曾经激励过人类的忠诚和抱负。……一方面,它否认过度的集权,而另一方面它又否认一律化的企图。”^②这是一种对立统一,而非简单的同一。正是其内在的多元性才使得团结一体性有别于同样性或单一性。这就恰如五味不同,才能组成一桌丰盛的宴席;五音不同,方可构成一篇美妙的乐章。

此外,我们还必须指出的是,“多样性之统一”与文化相对主义之间的差别。文化相对主义将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充满差别、对立、分歧、冲突和歧视的世界。而“多样性之统一”则认为,统一与多样性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互为补充的方面,多样性是对统一的一种外在的表达方式,实际上,存在于个人、群体及文化之中的多样性正是对人类一体及其根本统一的表现方式。统一的力量使得多样性成为和谐的原因,增强了人类各方面的能力,而不是导致冲突与竞争。“多样性之统一”的思想从根本上反对“多元化”的肤浅概念,因为这种所谓的“多元化”实际上是一种个人主义在群体与文化中的延伸。

而关于文化主导权的问题,恐怕更是文明对话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当今世界,由于科技、信息、金融、贸易、投资、交通、旅游、移民、生态甚至疾病的传播等等带来了种种全球化的趋势,虽然“地球村”雏形的出现带来了全球生命共同体的曙光,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全球化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它没有根基,缺乏文化内涵与精神支撑,所依靠的仅仅是经济的力量以及政治家们的想象。由此,摆在我们眼前的现状便是,全球化并没有促成天下一家的信赖群体、东西南北整合融汇的大同世界更像是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彼岸。而个人与个人、社会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分离、差别、冲突与歧视却愈来愈激烈,仿佛“地球村”所象征的不是和谐而是异化、分歧和斗争。而“文明冲突论”(“9·11事件”之后,“文明冲突论”仿佛更是成为一种世界思潮)则为这些纷争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依据。事实上,所有这些矛盾冲突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文化主导权由谁来掌握”这一问题所带来的。

“文明冲突论”所暗含的观点是,强势文明不可能放弃自身拥有的文化主导权,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所带来的只能是冲突与摩擦,且这种多样性势必为几个相互对峙的强势文明所取代,文明间真正平等对话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文化相对主义”则以含糊其辞的态度默认了各种纷争存在的合理性及其不可改变性。“和而不同”虽然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和谐共存的美好图画,但仍然没能解决

^① 这一原则还生动地体现在巴哈伊教的象征性建筑——灵曦堂(The House of Worship)上。目前,在世界上各大洲都建有向所有宗教、所有人群开放的、专供人们祈祷之用的巴哈伊灵曦堂。所有的巴哈伊灵曦堂都有一个圆状穹顶,底座为九边形,有朝向九个方向的九座大门,意即人们可以从任何地方进入。而“九”是最大的奇数,也有多种多样的意思。九个方向的九座门象征着各民族、各文化及各宗教的多样性,但它们又都归向同一个方位,圆状屋顶象征天下一家,所有的人类都在同一个空间中生存。这种建筑文化充分体现了巴哈伊教的开放性和广适性,以及它“多样性之统一”的精神。由此,在这种精神的关照下,根本消除因族群、性别、语言、地域、阶级、年龄和信仰所引发的根源性冲突才成为可能。(杜维明先生在多篇文章及演讲中都将这七类问题称为“根源性问题”,并认为由此而引发的冲突是最难消解的)

^② Shoghi Effendi,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Letters 28 November 1931*,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p. 41.

“谁为乐师”、“谁来掌勺”的关键性问题。

而巴哈伊教的“多样性之统一”的原则则以一个至高、普世的上帝解决了文化主导权之争的问题。继之，再以人人心中“神性的自律”使之成为可能。

事实上，巴哈伊教对于“统一”与“多样性”的看法是基于对人类存在的理解的，对巴哈伊信徒而言，造物主是唯一最高的权威，他是以其自身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在造物主面前无高低贵贱之分，人人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所反映的都是同一的实质。巴哈欧拉以上帝之口警示世人：“你们应当知道：我用同样的泥土塑造了你们，以免有人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这一点要时刻牢记！”^①然而，仅仅是这样的表白仍容易让人产生怀疑，因为这似乎与其他宗教所宣称的一样，而实际上，那些宗教对于不相信其信仰的人却并没有做到一视同仁。但巴哈伊教除此之外，还有一条“宗教同源”的理论^②，即认为世界各大宗教都是来自于上帝这同一神圣的本源，人们对至高的神（即上帝）虽称谓不同，但指的都是同一个独特的本体。由此，各大宗教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当这种宗教的一致性与人类一体的原则紧密相连时，就使得其信徒能够超越其自身民族的背景，冲破文化及语言等藩篱，而迈向一个更高的境界。当然，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单靠一种强加式的外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自我控制的内力，将信仰与行为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神性的自律。因此，阿博都·巴哈（Abdu'l-Bahá）力劝巴哈伊信徒应该“以身作则！”（“Live the life!”）^③这样，才能在一个唯一最高神的关照之下，以一种更健全更理想的个体生命形态来要求自己提升自己，而不是在其人类同胞之间做无谓的争斗。

这种来自同一上帝及其神性自律的观念似乎有些玄虚，不能够具体落实，不是一种有形的规范，对于无神论者而言，似乎也缺乏理论上的说服力。但实际上正是这种观念，对于消解文化主导权的问题有着一种根本的长远的意义。因为它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团结合一的力量并非任何社会或政治的概念，也不是人为的，而是一种精神吁求，一种坚信生命的终极意义需要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信仰。当然，这项事业之践行异常艰难，很容易使人将之视为畏途。针对人们的种种怀疑，巴哈伊哲学家守基·阿芬第（Shoghi Effendi）坚称：“巴哈欧拉所有教义所围绕的轴心——‘人类一体’的学说——绝不是无知的激情主义之爆发，也不是模糊的虔诚希望之表达。不应仅仅把这呼吁等同于人类兄弟情谊和友善精神之复苏，它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培育各种族、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和谐合作。……它的信息不仅仅适用于个人，更主要是关注于必然把所有国家和民族结合为同一个人类大家庭之成员的基本关系之本质。……它包含着一种挑战……它代表着人类演进之顶峰。……巴哈欧拉所宣扬的人类一家的原则，强调在伟大的人类进化过程中，达至这最终的阶段不仅是必需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它将很快实现，但如果是缺少一种来自上帝的力量，则绝无可能成功地建立起来……”^④

当然，真正的力量并不仅仅在于用理想化的语言来表达其思想，更在于对行动方案的具体实施及其产生的效果。事实上，“多样性之统一”的原则不仅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理论架构，各国的巴哈伊社团也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超越种族、阶级、国家、宗教、文化及性别的界限，

^① 巴哈欧拉：《隐言经》，李绍白译，新纪元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② Bahá'u'lláh,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pp. 78-79, 217; 'Abdu'l-Bahá,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pp. 41-42, 62, 126-127, 175, 287, 354; Shoghi Effendi, *The Promised Day is Come*, p. 108, etc.

^③ 'Abdu'l-Bahá, *The Importance of Deepening*,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p. 204.

^④ Shoghi Effendi, *Call to the Nations*, Bahá'í World Centre, 1977, pp. 30-31.

提供了人类尽管多样性但可在统一的全球社会中生活的实践证明。在此,我们仅举几例为证:

(一)致力于世界和平

1993年1月22日,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国际发展与冲突处理学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flict Management)和美国巴哈伊社团(American Bahá'í Community)联合创立了“世界和平讲座”(The Bahá'í Chair for World Peace)。该讲座的主要目标是在借鉴巴哈伊社团经验的基础上从事研究、设计课程、组织研讨会以及国际性的会议,以便认识到形成国家之间及国家内部的种族冲突、宗教冲突、文化冲突的原因,从而有助于寻求解决的方法。次年4月,马里兰大学历史系及世界和平讲座教席联合主办了“帝国的没落:宗教、民族与和平的可能性”研讨会,探索宗教与文化如何能增强达到和平的机会。会上,以色列吉他手大卫·布罗萨(David Broza)与巴勒斯坦籍阿拉伯音乐家纳比尔·阿尚(Nabil-i-A'zam)同台演奏,他们共同献演的和谐音乐展示了巴哈伊人士对中东冲突最终获得和平解决的殷切期望。

2000年6月,以巴哈伊教教义为原则创办的瑞士兰德格学院(Landegg Academy of Switzerland)在波黑开展了一项名为“和平教育”(Education for Peace)的项目,旨在打破波西尼亚人(Bosnia)与黑塞哥维那人(Herzegovina)之间种族暴力冲突的恶性循环。一小组兰德格学院的研究生在三个不同种族社区的六所学校中向教师、学生及其家长介绍巴哈伊教关于和平的新概念。这一项目持续两年的时间,覆盖了2000~2001年和2001~2002年两个学年。该项目结束时,不仅在当地学校的师生及家长中收到良好效果,也受到了波西尼亚教育当局及专家们的好评,认为该项目有助于将那些战争的制造者转变为自动的创造和平的人。^①

(二)维护文化的多元性,抢救土著文化

圭密族人(the Guaymis)散居在巴拿马西部的科迪勒拉中央山脉,除了拥有共同的语言外,族群间并没有紧密的联系。在巴拿马社会中,他们处于边缘地位,历来都是该国最贫穷的人群。他们的处境也与世界上其他土著民族一样:不断遭受外来文明的冲击,而这种影响往往是有害无益的。结果,有的圭密族人对外界愈来愈不信任,宁可承受艰难的生活,而变得闭目塞听;有的则接受了“拉丁人”的生活方式,迎合外界社会,愈来愈远离本族文化。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圭密族的巴哈伊信徒作出了大胆的尝试,以保持圭密族的文化,也帮助圭密族人学会了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在圭密族人的11个村落开办学习中心、教育儿童、引进新的农业技术、发掘青年人的潜力、赞助圭密族的文化和民俗活动,他们还创办了一家非商业性的电台,以圭密族的母语——恩加贝雷语(Ngabere)——制作、播出节目和新闻。1993年,美国人类学家惠特妮·林·怀特(Whitney Lyn White)花了三个月时间研究重获新生的圭密族人,最后,她得出这样的结论:“巴哈伊信仰在其架构中提供了新的领导模式,大大加强了群体归宿感。巴哈伊信仰还提供精神生活的原则,促进群体团结,使大家同舟共济。例如,消除种族和血统歧视的原则,便消除了家庭之间、宗族之间的疏离。”^②

^① “Landegg's Education for Peace Project seeks to break the cycle of violence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One Country*, 13, 2, July–October 2001, pp. 12–13.

^② “In Panama, some Guaymis blaze a new path”, *One Country*, October–December, 1994, p. 14.

(三)大力推广“世界公民”意识

针对“持续性发展”这一全球性课题,巴哈伊国际社团向世界持续发展大会第一次会议提交了一份声明:《世界公民意识——一种持续发展的全球观》(World Citizenship—A Global Ethic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在此声明中提出了一种崭新的观点:“建议采用‘世界公民’这一术语以囊括那些共同的准则、价值、态度及行为。若要持续性发展得以实现,这一原则必须为世界人民所接受。”^①声明进一步指出:“‘世界公民’的概念始于人们对‘人类一家’及‘地球是我们的家园’这种国家间密切联系的认可。尽管它鼓励一种健康的、合理的爱国主义,但它亦坚决要求一种更广泛的忠诚、一种对全人类的爱。然而,这并非意味着要放弃正当的忠诚,要压制文化的多样性,要废除民族的自治,也并非意味着要强力推行统一性。其特征是‘多样性之统一’。”^②声明还就“世界公民”概念的推广实施,从教育和公众意识等方面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措施。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巴哈伊社团还将“多样性之统一”的精神运用于泛宗教团结、环境保护、男女平等、国民教育、儿童培养、文化交流以及消除种族歧视等方面,在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的同时,也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肯定与赞扬。如,1994年10月24日,在有关阿约德赫雅清真寺(Ayodhya Mosque)事件中,印度最高法院以印度巴哈伊社团所提出的“社群和谐”(“communal harmony”)的原则为基础解决了这一起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宗教冲突,并在宣判书中引用了几段巴哈伊教的教义,如:“要维持不同社团间的和谐只能通过承认人类的一体性,并认识到将我们区分开来的种族及宗教划分是毫无基础的。”^③2002年3月21日英国的巴哈伊新年招待会,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送来贺信。在信中,他称赞英国的巴哈伊社团在促进多元文化主义及跨宗教对话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④2003年6月11日至13日,在欧洲议会(the European Parliament)大厅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展览,它是为了表彰巴哈伊社团在欧洲为促进社会和谐所作出的贡献。展览名为“巴哈伊国际社团:促进全欧洲多样性统一之百年展”(“The Bahá'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romoting Unity in Diversity Throughout Europe for over a Century”)。展览包括14个板块,以图片和文字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欧洲的巴哈伊社团以各种具体的项目和活动在促进和平、跨文化合作、宗教宽容以及商业伦理等方面所做的工作。^⑤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可以说,在这个由于不同种族、不同宗教或不同文化背景而挑起的连绵不绝的冲突所蹂躏的世界里,巴哈伊社团却是整个地球上最多样化而又最团结的人类组织之一。据《大英百科全书1992年年鉴》统计,巴哈伊教已在20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稳定的社团组织,世界各地的巴哈伊社团在基层,以众多的活动和各种项目来促进当地的种族团结、跨文化和谐以及宗教宽容。而其成员则来自2100多个不同种族,巴哈伊社团的这种成员组成反映了人类的多姿多彩,但其社团也是世间最团结

① World Citizenship: A Global Ethic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ublished by the Bahá'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2.

② World Citizenship: A Global Ethic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ublished by the Bahá'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2.

③ “Supreme Court of India highlights Bahá'í views on communal intolerance in Ayodhya decision”, One Country, Volume 7, Issue 1.

④ 引自 Bahá'í World News Service site(LONDON, 11 April 2002)。

⑤ “Exhibition Commemorating the Bahá'is' Promotion of Unity in Diversity in Europe”,引自 Bahá'í World News Service site(BRUSSELS, 11 June 2003).

的组织之一。多样性与团结统一并存于巴哈伊社团中。他们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文化模式。^①

以上,通过对巴哈伊教“多样性之统一”原则从理论到实践的梳理,我们论证了这是一个既充分保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又确保全球化进程向健康方向发展的原则。其实,“多样性之统一”这一原则对于中国人而言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外在的概念。正如我们前面所述,“多样性之统一”与“和而不同”对于人类未来都有着共同的美好设计,它们对于“和”(统一)与“不同”(多样性)也有着许多相似的见解。两种原则都意味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对于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而言,是有可能在各自保持其自身独特身份的同时实现统一、和睦相处的。总之,两者之间有着十分广阔的对话空间。自古以来,“天人合一”与“大同世界”的理想一直为中国人所向往与追求,儒家先哲就有“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的教导,《礼记·礼运》篇则有“大同”之说,又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些观念千百年来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一直传承不绝,直至近百年来,还有康有为著《大同书》,更有孙中山先生超越满清王朝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所提出的“天下为公”的口号,而这一口号既受到基督教博爱思想的启发,又与古代先贤的原初社会理想相契合。近现代以来,在民间信仰与本土文化影响下产生的一贯道,在其现代宗旨中也有“挽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贤,冀世界为大同”这样的说法。针对当今之世的文化多样性,费孝通先生也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②的主张。这些理念与巴哈伊教中的“人类一家”、“多样性统一”的概念可说是并行而不相悖的。

或许有学者会认为,巴哈伊教“多样性统一”这一原则将统一的根据诉诸上帝,而儒家所谓的“道”却比较偏重人世的一面,因而两者间相去甚远。的确,儒家之道在某种意义上可理解为人道,但在儒家大贤看来,人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天道相连通的,或者说,人道的终极意义在于天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维明先生把儒家的问题称为“天人学”(anthropocosmic)的问题。^③ 在不去消弭人道与天道之间的区别及相互关系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认为,人道与天道是同源的,甚至是同一个“道”的两个面向。这样,就像“多样性之统一”这一原则所昭示的,我们完全可以为“和而不同”赋以一个终极的根据与关怀,从而也可能把“多样性之统一”的原则视为对“和而不同”的一个现代诠释与提升。由此,“和而不同”便不再是一个静止的、对未来可能出现之新文化模式缺乏预见的概念,它所倡导的文化模式也不是一个单纯地将各种不同的文化拼凑在一起的大杂烩式的文化拼贴画。在“多样性之统一”原则的补充与提升下,我们对“和而不同”原则的理解便成为一种既建立在过去的传统之上,又是对人类的道德、行为、文化及活动所做出的全新诠释。

总而言之,在一个“天下一家”的大同世界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都是平等的,他们既

^① 我们注意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于美国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关于“多样性”与“统一”的观点与巴哈伊教义有某些相似之处,两者同存在沟通与对话的空间。但因目前流行“社群主义”理论较为复杂且不统一,较难将其作为一种已充分成熟的理论与其他理论加以对比研究。而它与巴哈伊教最显见的区别在于,社群主义理想并不真正具有巴哈伊教所拥有的灵性方面的远见。巴哈伊社团的建立是因为其信徒相信他们的行为是得到了神圣指引的。而社群主义者只是从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力图重新定义“社群”的含义。社群主义强调地方价值和地方制度的优先性,强调各社群之间的多样性。社群主义不强调在一定地理范围内举行统一的价值、实行统一的制度。社群主义强调不同社群间的多样性,却未必肯定社群内部的多样性。故社群主义的多样性是诸社群的多样性。社群自身的特征则是统一的,而不能是多样的。极端的社群主义者以单一的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泯灭与压制其他的社会角色,也容易流为扩张性的民族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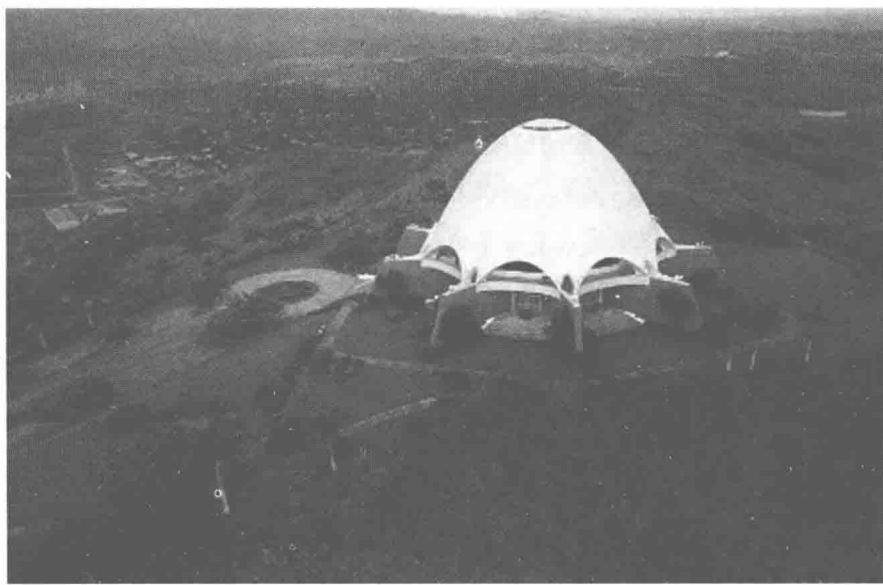
^② 费孝通:《论“和而不同”》,该文为提交“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载2000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③ [美]杜维明:《道·学·政》,钱文忠、盛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无长短之分，更无优劣之辨。无论是东亚、西欧还是南非、北美，都不是世界文明的价值中心或人类文化的终极意义。多样性的世界文化所增添的将是我们这颗星球的丰富与美丽。当我们无条件地承诺这样一个价值公设，即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都是平等的，而全人类都是同一个种族时，我们才能最终告别东西冲突、南北对抗和古今碰撞的纷乱时代，真正跨入和平与发展的新纪元。而一个不断发展的、和谐的全球文明也只有在多种人类文化充满活力的互动中才能出现。



澳洲悉尼巴哈伊灵曦堂



巴拿马巴拿马城巴哈伊灵曦堂